

文艺观潮

传承与建构中华新文化新经典

——茅盾、茅盾文学奖与新中国文学70年

□ 张丽军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即将颁发之际,回顾和总结茅盾及其遗愿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发现,如同鲁迅对百年中国新文学有着从未中断的文学影响一样,茅盾不仅以其多种文学实践、独特审美理念、丰富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审美资源和创作范式,而且在其逝世之后依然有着巨大的精神影响。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经过十届的评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最具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家大奖。它以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不断累积的审美品格和精神追求,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构民族的文学史诗,创造和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文化生活。

茅盾:对时代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

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茅盾是一位创作实绩极为突出和有着自己鲜明审美理念的作家。他在编辑、创作、理论与批评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的、开拓性的精神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茅盾属于“作家的作家”,是有着深厚理论背景、较高文化素养、引领时代审美文化的文学大家。

20世纪20年代,茅盾在文学翻译中,接触到了北欧文学,开阔了文学视野和审美理念。1921年,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这个社团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宣告了视文学为“游戏和消遣”时代的结束,接续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弘扬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传传统和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功用观。更为可贵的是,茅盾所倡导的“为人生”文学观,以一种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审美思维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化共同体的审美想象开辟了一条现代性审美路径,与鲁迅的“立人”思想、“精神界之战士”遥相呼应,推动了中国新文学主体精神和审美精神内核的建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茅盾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1927年开始,茅盾创作“蚀”三部曲和长篇小说《虹》,塑造了众多“时代知识女性”形象,准确把握、精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形象,有着开

创性价值,是对时代进行“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这需要同时对时代的深刻把握、理解和思考,不仅是对作家创作才情、生命体验、语言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社会观察、理论素养和哲学社会科学能力的挑战。这在今天依然如此,如何书写“当下现实主义”依然是21世纪的一个文学难题。

茅盾创作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进一步显现了其审美理念和文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司马迁“史传”传统的新发展,有着描摹、阐释与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雄心壮志。

长篇小说《子夜》是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作品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上畸形的金融资本市场,吴荪甫尽管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子夜》阐释和回答了资产阶级为何无力领导社会发展的时代中心问题,展现了“社会剖析派”的审美理念、创作方式和宏大叙事风格。

“农村三部曲”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现状与未来的整体性思考。作品是对变动的老中国、对“老中国儿女”的“新变化”书写,呈现出了“老中国儿女”的觉醒、犹豫、挣扎与新的嬗变。觉醒的、反抗的“老中国儿女”无可阻挡地站起来了。“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描写了一位一生都想“创业”的老一代农民老通宝形象,遗憾的是老通宝不仅没有致富、创业,反而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这让一生勤奮的老通宝百思不解,直至死前老通宝才有所悔悟,儿子阿多是对的,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有意味的是,老通宝的创业之路及其梦想,竟然一而再地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出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80年代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21世纪贾平凹的《金谷银山》都在不同程度延续和书写这一中国农民的“创业梦”。

20世纪50年代,茅盾发表《夜读偶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倡导“人民的文学”可以加一点象征手法,在现实中融入光明的指引和希望,融入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气魄,促进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文学奖:深刻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981年3月,茅盾先生在逝世

前夕,留下遗言,愿意把自己生前积攒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项,以此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以他捐献的25万元稿费为基础,设立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在1982年确定。后来,茅盾文学奖评选规则越来越细致,时至今日已评选了十届。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都牵动整个社会的文化神经,引起无数人热爱文学的评论家、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每届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评选都是各方广泛参与的文学盛宴,构成一段时间全民性文学狂欢和审美文化生活的共同主题。近四十年来,茅盾文学奖不仅深刻书写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以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参与、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精神变革和文化传承创新。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对茅盾文学奖作品的阅读、接受和社会评价,就是一个无比生动的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作为评选出的最优秀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作品深刻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具有巴尔扎克所言的“社会书记员”的历史功能和“同声共振”的审美角色。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与张平的《抉择》写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问题。前者呈现出改革初期的理想、激情及其困惑,而后者则以利剑出鞘、壮士断腕的方式直指改革中的弊端所在,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忧思和对深化改革的期盼,具有与当代中国社会同步性的审美精神特征。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改革发展史,与茅盾创作所力图达到描摹中国社会整体的宏大叙事审美追求不谋而合。

历届茅盾文学奖都很好地秉承了茅盾先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审美理念,对书写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塑造当代中国改革英雄,具有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的长篇小说尤为青睐。实际上,这既是中国的“史传”传统的继承,又是茅盾倡导的审美理念,更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急需、新世纪中国改革所必然要求的审美形态。

现代美育,诗教何为

□ 张桃洲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纯粹之快乐也”(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朱光潜《论美感教育》)等主张。这些美育观念从多方面推动了中国诗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促使诗教直面现代乃至当代的处境。

依照朱光潜的“诗教就是美育”这一说法,诗教显然是现代艺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似乎应和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虽然他所讲的“中国的诗”是指古典诗歌,并且中国诗歌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其样态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巨变,仅有百年历史的现代诗歌被认为失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和魅力,但是诗歌本身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处于现代境遇中的诗教,或者说在现代美育观念影响下的诗教,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向度:一是传统诗教的适应性,即传

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秦腔》、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和梁晓声的《人世间》,都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审美特征。《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王冠上的明珠,是当代乡土中国青年的成长宝典,几十年来始终居于当代中国文学阅读排行榜的前列,是畅销书和常销书。这部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就是因为路遥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人生现实苦难,以及由此激发出的人性深处无比坚韧的理想精神光芒。梁晓声的《人世间》具有与《平凡的世界》异曲同工的美学气质、精神力量。而《人世间》更接地气,接人间烟火之气,人物形象谱系更加完整,是对人间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面强攻,是一种整体性的、刻骨铭心的灵魂刻画,具有高尔基《在人间》的精神意味。

茅盾文学奖在重视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之外,还对文学审美品质有着极高的追求,特别倡导文学创作审美品格多元化、文学主题意蕴多样化。无论茅盾本人的创作还是历届茅盾奖评委,大家都特别重视和珍视作品的文学性。面对长篇小说创作所可能导致的审美风格单一化、创作主题窄窄化,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就有一条“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的规定。

姚雪垠的《李自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金宇澄的《繁花》和徐怀中的《牵风记》,都呈现出某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主题意蕴和浪漫主义审美品质。《白鹿原》呈现出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乡贤文化的深刻思考,有着深度叙事和文化创新性传承的精神追求。《牵风记》体现一种做减法、审美叙述风格和对历史、人、战争的审美批判,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叙事风格。而正是这种多风格、多主题和对审美品质的追求,茅盾文学奖在以“史诗”品格、现实主义审美风格建构长篇巨制的同时,具有了另一种审美质地、审美向度和审美追求的现实性存在。这才让茅盾文学奖摇曳多姿,让当代文学具有无比宽广的审美空间、多元交融的审美气质和向经典迈进的精神对话能力。

就当代文学经典化而言,茅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等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茅盾文学奖以其严格苛刻的准入门槛、客观公正的评选过程、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具有极高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不仅是四年一届中最佳优秀作品的评选,而且是众多优秀作家一生创作成绩的褒扬、肯定和奖励。今天,茅盾文学奖已经走出国门,获得了众多国外文学研究机构、研究者的认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远东文学研究和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会,就是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作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窗口,作为日常性和学位论文性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茅盾的审美理念、创作实践和其所倡议的茅

盾文学奖,以不同的方式滋养、培育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寄托着茅盾对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期待和理想的茅盾文学奖,不仅没有辜负茅盾和广大读者的期待,而且塑造和引领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风格、多元取向和审美质地,推动了长篇小说不断走向繁荣,建构了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内容,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同声共振,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品牌。茅盾文学奖正以书写“当代中国史诗”的使命担当,以“摆渡经典入瀚史”的方式,汇入当代中国、世界的文化洪流之中,传承与建构中华新文化、新经典。

(作者系山东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家园。在李美桦的笔下,乌地吉木这个偏僻穷苦的垦区,正是广大农村的缩影。《凤凰春晓》以独特的人文视野观照现实社会,对乡村世界进行了新的审视。作家在乌地吉木这个固有的精神家园里,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正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当下农村现实的真实写照。作品揭示了乡土社会蕴含的正面力量,让整部作品更加厚重坚实,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分量。

《凤凰春晓》围绕倪万喜曲折的人生际遇和乌地吉木小学的兴衰更迭,节奏把握冷热相济,故事波澜起伏,情节推进从容不迫,流水般无处不在的悬念设置,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尤其难得的是,作家运用大量的笔墨,用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推进情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恰如其分地嵌入了对联、便笺、收条、书信、报告、通讯等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的文体,以及别具地域特色的《日白谣》《瞧亲歌》,通民心、接地气、有温度,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加上作品大量使用金沙江两岸的方言土语,语言平实、通俗、生动、幽默诙谐,语境优美,在缜密的叙事中潜藏着时代特有的气息,使得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戏剧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温晓写

□ 伍立杨

四川作家李美桦的长篇小说《凤凰春晓》(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生动刻画了以倪万喜为代表的乡村教师形象,用时光碎屑里的细碎光亮,烛照了生命的执着坚忍。

曾经有个时期,在师资严重匮乏的偏僻乡村,那些未经过师范专业培训,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的农村青年,走上神圣的讲台,他们以代课教师的身份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匮乏的物质条件及社会上的种种偏见,他们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在三尺讲台坚守着、奉献着,为农村孩子走出大山筑起一条道路。如今,乡村代课教师已成为历史,但对于这个群体所作出的功绩,作为替时代立言、为人民放歌的文学不能忘记他们。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倪万喜,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走出乌地吉木这个彝汉杂居的寨子。可是,他发奋苦读,却一直沒有盼来大学录取通知书。铁桶般死困住寨子的大山,把倪万喜挡在了大学门外。他回到乌地吉木小学代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但他最终不仅放弃了高考,而且还舍弃到乡中学乃至县城发展的机遇,错过一次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每一次艰难的抉择,都镌刻着他在困境中艰难奋进的足迹。

文学佳作是抚慰心灵的良药,有着触及灵魂的力量。倪万喜和他的同事克服重重困难,把乌地吉木小学办得风生水起。在一步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他的命运也一次又一次遭受道义和责任的考验,特别是面对加快城镇化建设、村小生源日益稀少的境况,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再次作出牺牲,要求撤并这所耗尽他青春年华的村小。作家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表面不动声色,暗中激流涌动,牢牢抓住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通过在困境中的坚持、奋进与内心纠结,一步步把人物的命运推向高潮,展现出这个特殊群体的高贵品质。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家园。在李美桦的笔下,乌地吉木这个偏僻穷苦的垦区,正是广大农村的缩影。《凤凰春晓》以独特的人文视野观照现实社会,对乡村世界进行了新的审视。作家在乌地吉木这个固有的精神家园里,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正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当下农村现实的真实写照。作品揭示了乡土社会蕴含的正面力量,让整部作品更加厚重坚实,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分量。

《凤凰春晓》围绕倪万喜曲折的人生际遇和乌地吉木小学的兴衰更迭,节奏把握冷热相济,故事波澜起伏,情节推进从容不迫,流水般无处不在的悬念设置,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尤其难得的是,作家运用大量的笔墨,用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推进情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恰如其分地嵌入了对联、便笺、收条、书信、报告、通讯等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接地气的文体,以及别具地域特色的《日白谣》《瞧亲歌》,通民心、接地气、有温度,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加上作品大量使用金沙江两岸的方言土语,语言平实、通俗、生动、幽默诙谐,语境优美,在缜密的叙事中潜藏着时代特有的气息,使得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戏剧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